

## 一代宗师出琅山

京西琅山村出过一位高僧，法名法安，任僧录司正印，统领全国佛教数十年，是晚清时期的一代宗师。

根据《王氏家谱》，法安俗姓王，名谦，祖籍山东兖州滕县，其先祖王国贤经商来京，在琅山村安家落户。法安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一月十三日，自幼心安禅定，与一般儿童不一样。7岁那年，有位江湖术士给

法安相面，说法安骨格清秀不凡，应为一代宗师。法安的父母特别高兴，将法安送到承恩寺出家，拜德瑞老和尚为师。法安学习刻苦，白天学习诗作和书法，晚上学习佛经。随着年龄的增长，法安协助办理寺院事务，事无大小，一切办理得从容自如。

法安24岁那年，应潭柘寺慈云律主邀请，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僧人。法安在潭柘寺学习戒律，严守戒规，出入起居遵守寺院制度。凡见过法安的人，都说他是遵行戒律的模范，一言一行都按戒律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期满，法安仍回承恩寺处理事务。

一天，法安到八大处秘魔崖游览，不期与贤良寺一法师相遇。二人攀谈，话语投机，刚一发现法安对佛理领会至深，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且言辞流利，义理通达，遂邀法安到贤良寺任监院，法安欣然应允。法安上任之后，将过去废弃的事情都兴办起来，越来越完备。于是，晨一法师将信众当众传给法安。从此，法安遂为贤首宗第三十六世传人。

贤良寺距紫禁城近在咫尺，规模宏大，是京城著名寺院。一些有名望的权贵，都喜欢到该寺寄居。凭借这一有利条件，法安经常与名流聚会，谈诗论文。

法安的学问得到名流的认可，把他和唐代诗人贾岛、宋代名僧佛印相提并论。听到名流的夸奖，法安越发恭敬谨慎。法安在寺数十年，补偏救弊，任劳任怨，晨一法师顺其自然，尽享清闲之福。

光绪二十四年（1898），晨一法师年迈，打算退居静养，对法安说：“我血气既衰，无所作为，你应当为贤首宗宗主。”于是在僧人面前，将住持一席交付法安。法安天性慈善，扶危济困，排难解纷，于资财毫不吝惜：遇有长途乞求怜悯者，周济路费，使其

速返家园；邻居有断炊的，赈济钱财，使其全家度过难关；甚至因结怨斗殴、逮捕入狱的，法安也设法营救。种种善德，不可胜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内务府大臣世中堂（世续）批准，授予法安僧录司副印官职，当时送幡挂匾祝贺者不下数千人。法安荣任僧录司副印之后，与正印和衷共济，相处四年，始终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僧录司掌印告退，法安补正印之职。凡有百姓与僧人因争论而诉讼的，谁是谁非，法安当堂做出判决，从不偏袒僧人。法安的所作所为，民间颂声载道。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归西，法安恭办诵经道场，选拔僧众，设立经坛，虔诚讽诵。时日一久，有人疲惫偷安，法安劝勉说：“朝廷待僧人不薄，如今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我等应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宜振奋精神，不得轻慢。”众僧闻言，日夜惕厉，不敢懈怠。到交差之日，毫无过失。

宣统元年（1909）春，晨一法师旧病复发，至三月初四日，晨一法师驾鹤西归，法安亲扶华丽棺木，将晨一葬在翠微山南贤良寺老塔院内。宣统二年（1910）

春，信徒请法安传授戒律，超度弟子三百余人。法安见各地讲说戒律，有欠详明，特邀德高望重的高僧，由引礼师辅佐其事。高僧的讲解，详细明白，诸弟子仪容庄重，齐整如一，观者莫不称善。讲经结束之日，法安有诗一首赠诸弟子，诗曰：“神仙佛祖岂天生，全在专心苦用功。若要明心复见性，祇园鸢岭即飞升。”

宣统三年（1911）二月，贤良寺大悲坛年深日久，行将倒塌。法安随缘募化，选择吉日重修，费金两千余两。重修后的大悲坛，华美壮丽，倍壮观瞻。贤良寺虽是国家官庙，但田产不丰，常住土地只有八亩左右，数十位僧人衣食不周。法安处世节俭，多方谋划，自任僧录司掌印以来，置地两项有余，建房三十余间，地纳米粮，房赁银币，除香火供佛开销外，尚且有余。

法安事事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当他看到老塔院已无隙地，自己年过花甲，将来葬身何处？光绪三十三年，法安邀慈因寺静禅和尚一同到八大处踏勘，意在有生之年，预建塔院一处。二人同至虎头山巅，但见翠微山以北的白塔坡蜿蜒起伏，逶迤向虎头山而来，是风水格局的理想境界，法安不禁大喜，于是在老塔院以东建塔院一处。民国元年（1912）春天，工程开始，当年秋天，塔院落成，命名为贤良寺塔院，当地俗称东塔院。塔院现存二塔，均为喇嘛式，砖石结构，坐北朝南，东西排列。东塔高约7米，为法安弟子之塔，至今尚属完整。西塔高约8米，为法安之塔，塔刹已失。塔以北，有《贤良寺塔院碑志》，静禅和尚撰文，光绪三十三年进士常恩昆书，民国二年（1913）立碑。碑文记述了贤良寺塔院选址及兴建始末。二塔以东，为塔院阳宅，这种附设阳宅的塔院，如今已不多见。阳宅的院门上有一联：“云山半壁，天地一庐。”将秀丽的西山当作影壁，把苍天覆盖下的大地当成自己归宿的草庐，胸襟宽广，意境高雅。阳宅有房12间，其北向着，额曰“息虑山房”。阳宅的南屋、东屋，除用于放置日常生活用品外，其余都用作园丁宿舍。又于附近购地二十亩，供园丁耕种。民国十九年（1930）八月，时年83岁的法安撰写《贤良寺翠微山塔院后记》，描述他退休后在塔院阳宅避暑的情形：“每当夏日，开轩远眺，平畴则彩云如毯，列岫则翠黛横空，梵宫数处，掩映于丹崖碧嶂间，暮鼓晨钟，发人深省。使退老居此，亦足以消遣世虑矣。”

（李新乐 李保宁）

## 记清代颐和园的马厂残墙

清代北京城有三重城墙，分别是内外城城墙、皇城城墙、紫禁城城墙。近代以来由于城市功能转化，内外城城墙及皇城城墙已所存不多，唯有紫禁城城墙仍然守护着故宫。

三山五园地区是清代紫禁城外的又一处政治中心，这一地区虽然没有重重的城墙，但是几座皇家园林及众多王公赐园都有围



《京畿水利图》中的马厂围墙

墙。除此之外，地处圆明园与清漪园之间的马厂也有围墙，并设有马厂东门和马厂西门。当时由圆明园到清漪园，需要进马厂东门，经过马厂，再出马厂西门，才能到达东宫门。这些围墙的存在有利于皇家园林

的保卫工作，同时也可以起到点缀景观的效果。马厂，又称西马厂、西厂（因位于畅春园以西），是清代自康熙以后阅武及施放火戏的地方。康熙时，查慎行受诏赴西厂观火戏，他在《醉太平·丙戌元宵召赴畅春园西厂观烟火》中写道：“墙东玉虹，桥东烛龙，丹楼一朵云红。是宵中且中，烟浓雾浓，凌空架空，西山一带朦胧，隔千重万重。”马厂中建有阅武楼，乾隆曾在此邀请番部首领观看八旗官兵操练，



颐和园东宫门外的马厂残墙

用以威慑。晚清时期马厂成为新军军营，以后很长时间作为兵营使用，今天则多成为住宅区。

现今马厂仅存残墙一段，位于颐和园东宫门外军机处以东，虎皮石质。这段虎皮墙与弘旿《京畿水利图》中所示的马厂大墙样貌相同，在清代“样式雷”图档中也有明确的标识。阅武楼基址在西苑地区改造中被毁坏后，此处残墙就成为马厂唯一的地上标志，它同时也是三山五园地区围墙景观的标本。本着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三山五园）北部文化传承发展带串联颐和园、圆明园等重要景区及大宫门、青龙桥等城市节点，重点加强历史文化挖掘、修复与利用”的要求，我们建议在马厂残墙边立说明牌，讲述马厂的历史变迁，讲述少为人知的马厂典故。（张鸣飞）



◆主管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印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 编：祁庆国  
◆发送对象：北京市文博工作者  
◆印刷单位：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9917—L0023号  
◆2018年第2期（总第256期）  
◆2018年4月28日印刷  
◆印数：2000份

## 北京市文物局召开2018年度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2018年3月30日，市文物局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彝伦堂召开2018年度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平同志主持。局领导班子成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文化局纪检监察组及市委宣传部基层处领导、全局副处级以上干部1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按照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党建工作部署，结合市纪委监委驻市文化局纪检监察组重点工作任务，深入推动全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提升我局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国民同志总结了2017年市文物局系统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对2018年市文物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做出了安排和部署；驻市文化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沈其顺同志就综合派驻纪检组的职责做出了进一步说明，通报了2017年度信访举报情况，并对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同志与局属单位党政负责人共同签订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责任书并讲话。

舒小峰同志指出，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新时代党的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为统筹谋划新时代党建工作发展，推进首都文博行业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

舒小峰同志强调，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号角，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意愿的

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全局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抓好学习贯彻。

一是各级党组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整体谋划首都文博事业改革发展。

要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在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上下功夫；要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谋划新时代首都文博事业改革发展；要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党建重点任务落实。

二是各级党组织书记要争做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

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把讲政治放在首位，抓好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在夯实基础上找准着力点，要深入开展“五对照，五反思”。对照信念坚定，反思政治理论是否过硬，政治立场是否坚定，政治信仰是否牢固；对照为民服务，反思宗旨意识是否扎根，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否强烈，党员群众是否信赖；对照勤政务实，反思职责目标是否清晰，能力素质是否过硬，工作方法是否科学；对照敢于担当，反思模范带头作用是否敢为人先，矛盾面前是否敢抓敢管、大事难事是否敢闯敢试；对照清正廉洁，反思道德防线是否筑牢，纪律规矩是否坚守，不正之风是否抵制。要通过

“五对照，五反思”，真正查找我们在党建重点工作、

巡视整改任务、支部规范化建设等任务上是否抓实抓细，是否真正履行了一名全面从严治党的书记职责。尤其是机关党支部书记要切实履行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党建引领，促进业务工作。

三是深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巡视整改任务。

要聚焦“四风”突出问题，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走好新形势下群众路线；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净化政治生态，切实关心爱护党员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坚定政治立场，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舒小峰同志要求，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更加坚定地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坚持首善标准，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紧紧围绕重点工作，充分调动各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为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促进首都文博事业全面发展做出贡献。（市文物局机关党委）



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文物志复审会现场

## 《北京志·文物志》复审会召开

4月11日，第二轮《北京志·文物志》复审会在市文物局召开。市文物局局长、《文物志》编委会主任舒小峰及市文物局副巡视员、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刘正品出席，编委会委员、《文物志》总编室、史志办成员等参加；市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陈玲，市方志馆副馆长刘宗永及该志责编列席。会议由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任祁庆国主持。

首先由《文物志》执

行了认真评议。

陈玲同志指出，市文物局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市地方志办要加强与市文物局的合作，致力于在常态化建设、依法治志等方面推动地方志事业转型，并将进一步加强修志保障。

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同志根据编委会委员意见宣布《文物志》通过复审、报送终审的决定，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修志工作；二是要落实编委会评议意见，精心修改志稿；三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为做好下一轮史志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市文物局史志办）

## 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工作取得新进展

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不断深入，为了保证考古工作不影响建设进度，北京市文物局积极了解工程情况，主动服务，重点保障，加强考古力量，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

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D区D-04地块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区域的北部，距离2016年新发现的路县故城遗址约850米，目前正在开展全面考古勘探、发掘工作。该项目用地面积约63万平方米，已完成考古勘探32万平方米，探明各类古代遗迹370处，其中汉代至明清墓葬338座，汉代窑址32座。

为了保证考古工作不影响建设项目进度，考古发掘工作同时开展。截止到4月18日，已发掘清理完成儿童瓮棺



M86 出土器物

墓葬2座，汉代墓葬54座，唐代墓葬7座，明清时期墓葬2座，汉代窑址13座，出土陶、瓷、铜、玉石器等各类文物300余件(套)。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汉代墓葬以陶制明器为主，种类多样，主要为罐、灶、俑、仓、盒、奩等。有的墓葬出土汉代铜镜、铜带钩，有的墓葬中出土玉环。唐代墓葬及明清墓葬出土文物主要为陶器、瓷器、铜钱、铜带扣等。

在发掘完成的窑址中，一座汉代马蹄形窑址显得尤为独特。在窑室清理过程中，发现窑床有大量烧制完成并摆放整齐的青砖，上下两层交叉摆放，为了更好地烧制，每块青砖间都有一定空隙。青砖的规格与窑址周边多座汉代墓葬用砖规格一致，因此，可以初步推断，该座窑址应为周边修建墓



汉代马蹄形窑址 Y13

提供用砖的烧陶窑。半倒焰式马蹄形窑址是北京地区汉代烧砖用的常见窑址形制，这类窑址的窑门一般高度较低，不大适合人的进出，装窑和取出产品似乎另有地方，极有可能就在窑室顶部，在装坯和取出成品时只需将顶部打开，用泥封顶，非常简便。北京地区汉代发现数量较多，但在窑址内发现大量烧制完成且摆放整齐的青砖较为少见，该座窑址的发现，可以很直观地展现了汉代砖窑的形制、烧制手法及烧砖用途，证明了汉代



唐代墓葬 M47

砖室墓葬与窑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为通州汉代路县故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

从2018年初到现在，全市开展的配合各类建设工程开展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已达47项(勘探40项，发掘7项)，建设项目面积大，工期紧，任务艰巨。为此，北京市文物局加强统筹协调，调配人员，突破创新，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考古工作，取得了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双赢的良好效果。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 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刊物。每年发行六期，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建筑调新发现，考古工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活动，学术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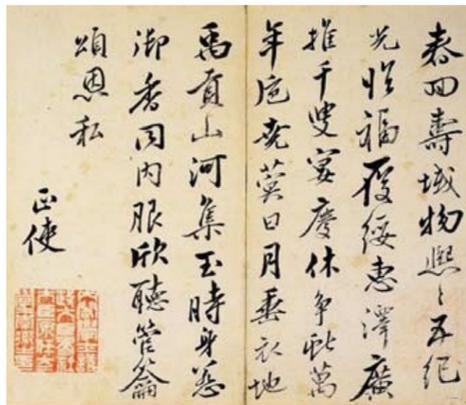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宜，图文并茂，并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为：[bjjwzb2005@126.com](mailto:bjjwzb2005@126.com)

**特别说明：**2016年2月，《北京文物》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订阅号“北京文物报”。自2016年3月1日起，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 朝鲜国使臣与千叟宴

康熙时期的两次千叟宴，皇帝仅召集了国内的老臣与长者赴宴，声势虽大，但影响仅限于国内。及至乾隆帝所举办的两次千叟宴，当朝满汉蒙古的老臣必不可少，国内边疆诸少数民族也要求参加，就连朝鲜、安南及琉球等域外藩国也在受邀范围内，出现了



李徽之在千叟宴上的献诗

四海一统、九州同乐的盛况。朝鲜作为中国最密切的邻邦，积极参与了这两次千叟宴，在这场盛世大宴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身影。

乾隆四十九年(1784)闰三月，皇帝下令“于明岁新正举行千叟宴”。同年九月，正式向朝鲜下旨：“所有今年岁贡正、副使内，酌派年在六十以上者一二员来京，俾得与兹盛典，共沐光荣。”按照乾隆帝的要求，本年朝鲜派往清朝的岁贡使团，其正、副使二人必须年满六十，并且他们将同时参与本次千叟宴。一个月后，乾隆帝的旨意传到朝鲜，国王正祖便与大臣讨论派何人前往。时任左议政李福源、领府事金尚喆及判府事徐命善与李徽之都表示可以领旨前往，正祖鉴于左议政的眼疾及徐命善的身体状况，决定派李徽之为正使，姜世晃为副使，李泰永为书状官，“李正姜副”的使团结构初步确定下来。

李徽之(1715—1785)，全州人，出生于宦宦世家，英祖十七年(1741)通过生员进士试，以恩荫入朝为官。以正使的身份赴北京参加乾隆五十年千叟宴，正祖九年(1785)过世。

姜世晃(1713—1791)，晋州人，书法家、画家，

其祖父姜柏年曾任领议政。姜世晃以副使的身份参加乾隆五十年千叟宴，正祖十五年(1791)过世。

正祖八年(1784)十月九日确定出使人选后，为了尽早抵达北京朝贺，仅过了三天，此进贺谢恩兼冬至使一行虽未完全准备妥当，就匆忙离开汉城。行前，国王还提醒李徽之，“今番谢恩，系是莫重之事”，“到义州后，虽留一两日，必须如期驰赴”。君臣辞别之时，正祖还激励两位老臣，希望他们能在中国彰耀朝鲜的鼎盛文化。为此，国王还以诗相赠，云：“老矣卿非出塞时，关河暮雪动离思。一条衿篆三清壁，千叟筵参四海旂。翰墨须教天下闻，颜眉从遣画中移。好音谁付行人去，世远西周柞棘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国王对老臣的挂念与嘱托。

依据同行使臣金洛瑞《北征录》的记载，李、姜一行人经过两个多月路程，终于在十二月初八日，也就是中国的腊八节当天抵达北京，入住正阳门南馆。

结合正、副使发回的状启，十二月十五日，朝鲜使团三使奉旨入宫参加早朝，由午门入宫，立于朝臣队伍中的西侧。同月十八日及二十日，皇帝通过礼部赐给了朝鲜国王如玉器、丝绸、羽绒、漆器、笔墨纸砚等不少礼物。二十一日，三使随同皇帝前往瀛台观看滑冰表演。朝鲜使臣先到西华门外等候，乾隆皇帝乘车到后，向使臣询问朝鲜国王是否平安，使臣答然。此后，使臣又陆续参加了辞旧迎新的多次宴会，二十九日于保和殿参加除夕宴；正月初一于太和殿观狮子角抵杂技；初二于紫光阁参加岁首宴，皇帝给正、副使臣赏赐了筒帛、丝织品等物，因为要求使臣呈送千叟宴诗，特意赏赐了笔墨纸砚。

正月初六，正、副使赴乾清宫参加千叟宴。这次宴会规模宏大，据《清史稿》记载：“设宴乾清宫，自王公迄内外文武大臣及致仕大臣、官员、绅士、兵卒、耆衣、工商与夫外藩王公、台吉、回部、番部士官、土舍、朝鲜陪臣，齿逾六十者，凡三千余人。其大臣七十以上，余九十以上者，子孙得扶掖入宴。年最高者，如百五岁司业街郭钟岳等，得随一品大臣同趋脯座，亲与赐觴。宴罢，颁赏珍物有差。”乾隆五十年千叟宴，参与人数之多创历史之最。除皇帝宝座前的御宴外，宴席共分八百桌，在乾清宫广场前分东西两路对称摆设，每路六排，每排席数不等，前排桌数较少为二十二席，后排多者每排一百席。千叟宴席还分为一等桌、次等桌两个



姜世晃《瀛台奇观帖》

级别，餐具、菜品都有明显区别。其中二品及以上官员和外国使臣桌席居于首席，在乾清宫殿内及柱下，享一等座，三等及以下官员桌席摆在乾清宫广场，享二等座。朝鲜使臣享受二品大臣的待遇，得以在乾清宫内参加宴会。朝鲜使臣参会过程中，皇六子永瑨向

其询问国王及使臣的年纪。宴后，乾隆赐给使臣们御制千叟宴诗一张、寿杖一根，另有布匹绸缎、笔墨纸砚等物。李徽之与姜世晃在宴会上也联句赋诗，全宴共计得诗3429首。

千叟宴后，朝鲜使臣又多次参加各类清代宫廷活动，多次获得皇帝的赏赐，直到正月二十五日才启程返回朝鲜，三月初一日渡过鸭绿江回到义州。三月十七日，朝鲜国王召见还都的李徽之、姜世晃，相互寒暄后宣读了乾隆皇帝的敕令，宣布大赦。本次使行最终圆满结束，历时五个多月。

朝鲜使臣参加这次千叟宴，不但获得了乾隆帝的欢心，巩固了中朝两国的藩属关系，还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正祖所希冀的“鸣国家之盛，夸示外国”的愿望。正、副二使都是饱读诗书的文臣，吟诗作赋并不在话下，尤其是作为副使的姜世晃，书画诗文皆为一时之绝，甚至其画作还早已传入中国。据朴趾源《热河日记》记载，他于正祖四年(1780)出使中国时，途径永平府见苏州人胡应权所藏之《溯上画谱》，其中

就有姜世晃的《兰竹图》《墨竹图》两幅。姜世晃的文集《豹庵稿》中，收录了多首有关中国名胜或使行要事的诗篇，如《瀛台冰戏》《蓊门烟树》《西山》等。除此之外，作为名画家与书法家的姜世晃也在使行途中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画作与字帖，如《寿域恩波帖》《瀛台奇观帖》《燕台弄笔帖》等。这些画作描绘了燕行途中所遇之山水或重大宫廷典礼，书帖则是姜氏燕行途中之感言及与他人的酬和。后来的燕行使来到中国时，还会听到中国人对姜世晃的仰慕之语。

燕行途中，正、副使与书状官相互唱和，姜世晃也为中州美景挥毫泼墨。抵达北京后，朝鲜使臣除了进献千叟宴诗之外，还与中国仕宦、文人交流，其中有满族文臣博明、和林及德保，还有汉军旗人金简，以及汉族学者颜应伟、刘人直、陈杰等人。回国之后，正使李徽之将诸人唱和之诗文合装为一册，命名为《唯能为也集》，现藏于韩国江原道翰林大学博物馆。

除却前文已言及的政治意义外，李徽之、姜世晃的这次千叟宴之行，不但再次实现了姜世晃长久以来亲赴中国饱览神州风华的愿望，还促进了中朝两国之间的文人交流与书画传播，在中朝两国的文化史、书法绘画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绘画史上，两国文人画出现了交流日渐深化的趋势。总

## 承恩寺教谕碑与承恩寺教谕的异同

承恩寺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正德五年至八年间(1510—1513年)修建，属于富有神秘色彩的古刹，尚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有待破解。寺庙创建者、明武宗身边比较宠幸的司礼监太监温祥，《明史》无传，零星见于其他人的传记中。现有关于承恩寺的两道教谕存世，一是以文书的形式，一是以教谕碑的形式，内容以护持庙产为主，其他信息略有不同，为正德皇帝同一天颁发，极其珍贵。同一个皇帝对同一座寺庙在同一天颁布两道内容不尽相同的圣旨，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充分暗示此庙非同一般。

两道教谕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不同的地方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热点。先说相同之处：

1. 颁发教谕的目的相同。开头写“教谕”目的，遵照固定格式，内容基本相同。点明帝王格外宠遇嘉奖那些与自己朝夕相处忠心耿耿服侍自己的侍从，目的不单是报一时之功，主要是为了劝忠示义，传之久远。

2. 正德皇帝对温祥的评价很高。两道教谕尽管用词不同，但意思是相同的，主旨是夸赞司礼监太监温祥天资聪明，悟性超群，被选拔入内书堂学习训练，侍候皇太子(即未来的正德皇帝)尽心竭力，忠心勤劳，廉洁奉公，人人称道。皇帝即位禄秩并升，提拔到司礼监当太监，辅佐皇帝，参与军国大事，获得了大臣们的一致称赞，说明温祥的能力才干也得

到皇帝的高度认可。

3. 温祥建寺的意图一样。两道教谕均明确提到，温祥用自己的钱建承恩寺的同时，为身后之计在旁边预置墓地和祠堂。这也和明朝许多太监建庙的意图相吻合。

4. 教谕要起的作用一致。两道教谕在结尾处都写明，担心时间一长，承恩寺的庙产会遭到势要奸人的侵凌和盗卖，于是皇帝特降敕责成有司保护，借此表达皇帝怀贤以图久远的至情，要求远近官民僧俗人等都要遵守圣旨，否则严惩不贷。

再说不同之处：

1. 庙产数目。教谕碑提到的庙产有两个数据，首先是买了宛平县香山等乡民人王鼎等的土地四顷有余，盖了一座承恩寺；其次又买了田村锦衣卫百户赵弘远三顷多地，作为香火地，四至分明。两项相加，承恩寺庙产多达七顷有余，要保护的地产翻了一番。教谕文书只提到了买田村锦衣卫百户赵弘远的三顷多地。这其中差别不小。

2. 承恩寺额。教谕碑中提到了承恩寺的寺额是正德皇帝所赐。教谕文书中只提到温祥自己出钱盖了承恩寺，并未提皇帝赐寺额。



明正德八年“承恩寺教谕碑”碑文拓片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两道教谕尽管大同小异，但教谕碑包含的信息多于教谕文书，且声明是温祥请求、皇帝允准。

(苗天城)